

《写给狱友的信》

作者 妙航

许先生，你好！

这一两天就刑满释放，坐了五年的大牢，终于能够走出电网高墙、警戒森严的监狱了。我比你先出来一个多月，也就是五十天，但监狱的阴影早已淡然无存。昨晚夜深人静时我还想，人太容易忘却过去了，五年的监狱生活，那深深的仇恨，为什么就毫无感觉了？甚至在出狱的第一天，那一切都仿佛成为过去，而招之不回……

这使我想到了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中国军民死在恐怖与凌辱之中，这本应是永久的民族仇恨，但一晃就过去了。看看今天的中国人不仅对日本人很友好，甚至尊敬崇拜的都有点过分。

再往远看，秦国打败了赵国的那位纸上谈兵的将军，坑杀了赵国四十万士兵。为何赵国的后代却丝毫感觉不到一丁点的仇恨，这又是为什么呢？

还记得“彩凤”吟的那曲小令吗？她说：呼君欲眠月儿低，几经辛苦不成泣。问君忧怯什么事？几经风雨无是非。那位“青娘”更是心死如灰，她说：浮沉苦海此半生，瑟瑟风雨从不停，如今爱恨全泯灭，青灯傍佛终此生。还是“玄女”说的好：心自欲海归，风浪早平息，百千亿万年，谁人载得归。恩怨何曾是，面目已全非，东西今犹是，映出万千辉。

想想也是，东方人和西方人都可以和解，八国联军、鸦片战争早已成为过去，为什么同为东方人的日本和中国，不能握手言和呢？

在 2000 年 12 月，我和秋云去广西的“北海”市旅行，一个刚从越南旅游回来的当地人指着一片旧楼群对我说，那里住的都是当年越南排华时赶回来的二十万中国人。越南当局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然后扫出国门。我后来想，在 2001 年 1 月 1 日南京当局去重庆抓我和秋云时，首先也是没收了我的一切财产，没收了秋云的一切财产。在 2006 年 1 月 1 日把我从南京监狱扫出狱门时，正如南京当局的人对我说的：当你获得自由时，你已身无分文，一无所有。我问：我靠什么生活呢？当局的人说：你可以向国家申请低保！我想，我不会向国家申请低保的，天总是无绝人之路。

我问那个广西人，中国出兵把越南打了，而且打得很惨，也死伤了不少人。越南人恨不恨中国人？广西人说：不恨，越南人对中国人很友好。

我真是想不明白，这也许和我们受的国民教育有关：不忘阶级苦，牢记民族恨。难道越南人就没有民族恨吗？难道越南人也懂得中国人古老的祖先叮嘱后代子孙的话：爱爱恨恨一笑泯，心海湖平月光明，归去，风雨总成晴。

我想，现代中国人尊崇日本人，不仅仅是势力眼，看人家有钱，想让人家多给点钱。也在于看到日本民族的那种发奋图强、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一片焦土的战败国，在耻辱中咬紧牙关，宁肯付出一切代价，重振国威，而成为今天的世界经济、福利大国，使人民过着令中国人羡慕的生活。越南人呢？是否也是羡慕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的犹如变戏法一样的经济成果：昨天还是半斤肉、三两油，今天却是让人眼花缭乱的物质生活……（待续。写于 2006 年 2 月 20 日）

许先生，我走出监狱大门那天正逢元旦，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庆祝新年的到来。我仿佛就是那个“新年”，刚刚走出天堂来到了人间，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阴森的监狱大门外的广场上空无一人，我不知向何处去，也亏得有不死的朋友来接我，让我进了南京的一家酒店。床上摆着几件新衣服，朋友坚持让我好好洗个澡，扔掉所有的衣服，换上新衣……

我说：监狱里的囚犯们让每一个出去的人都洗个热水澡，尽管热水紧张有限，平常因争一瓶开水都要大骂大打出手。但是当囚犯要出狱时，都会送来自己的那瓶热水，让出狱的人洗个痛快……洗完澡要换上最好最干净的衣服。如果本人没有，就会有人把自己的新衣送过来……囚犯们认为，从大牢里出去的人本来就让社会上的人看不起，倍受歧视，若再穿上又脏又破的衣服，会更加无地自容。

大陆的监狱和海外、国外的不同，进去的人都要被强迫剃光头。但是在出狱前的一两个月里，狱警就允许留头发了。囚犯们把允许留头发看的很重，以为这样社会上的人就会认不出自己是刚从大牢里放出来的。我想这是人类心理上的误区，人的行为总以别人的眼光为标准，而不能以自己的眼光为标准。我丝毫没有那种怕让人认出来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我始终坚定的认为自己不是罪犯。我在监狱里服刑，总感觉自己就像当年的新四军在上饶集中营里服刑。我穿着一身囚服，戴着囚帽，越看自己就像新四军。

也许你没有那种感觉。在监狱里我远远的看到你时，你总是满脸的愤恨……当然，那时我们无法接近和交流，因为我们是被内定为政治犯的，是被隔离禁止交流说话的。你可能会认为自己坐牢很冤屈，认为一个堂堂的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怎么成了监狱里的罪犯，并且和大量的强奸犯、盗窃犯、抢劫杀人犯、诈骗犯、贪污犯等等关在一起，而且南京监狱的狱警是对诈骗犯最好，对贪污犯最宽，对抢劫犯最信任，对强奸犯最恨，对政治犯最严、最无情。也许你认为是把你这条小鱼穿到大串上了，因为南京监狱号称百年监狱，现在又是重罪监狱。我到是认为上是一人家偷牛你拔橛子，也许仅是个倒霉而已。你坐牢是政治的需要，因为要给我这个写书的人定罪，就必须抓个印书的人。可偏偏就是你，不知从哪儿捡了几张我写的手稿的复印件，给印成了小册子，才卖了几百块钱，连支付印费的钱都不够。我写的手稿有四百多万字，你只捡了两万字的手稿复印件，而且我还不认识你，也没听说过你，连我都觉得你是够冤的。有时我想，也许是因为你是重庆人，尽管一直在南京工作。如果你是南京人的话，这个替死鬼就很难说落在谁的头上。因为必须要抓一个印书的，否则无法给我这个写书的定罪，如果你不坐牢，那就得有另一人顶罪坐牢。

我想应该换一个角度去理解。和平时期，当局的防范意识是很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刺激决策人敏感的、脆弱的神精。阶级斗争观念形成的思维惯性，会造成思想和行为上的防范失度。芝麻大的小事也会被政治炒作成动摇政权的稳定而十万火急的去上报中央。中央并不认识我，也不了解我，当然也不会认识和了解你。中国又是个专门善长舞文弄墨的国家，善长上纲上线。大到国际形势美国反华，小到台独分裂中国这么混起来一分析，加上南京上报的敌情动向分析报告里的添油加醋，你我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国家的头号敌人。立即下令拘捕入狱，方能高枕无忧天

下太平，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我想，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我们为此而坐牢又算什么？社会的安定，再小也是大；个人的一生，乃至生命，再大也是小，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当年的岳飞可以不去风波亭问斩，他为什么伏法受斩呢？是传统教育的结果，个人生死是小，国家大局为大。（待续。书于 2006 年 2 月 20 日）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的现代观念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很大的差异。一百多年前，美国发生了一件错杀女巫的事，事后美国制订了一项法律原则，即：宁肯错放十人，也不能误抓一人！

百年前美国的这项法律原则一直延续至今，这恰恰和中国历来的法律原则相反，即：宁肯错杀一万，决不放走一人。

上述这两项法律原则都正确，区别在于立点的不同。美国的原则其立点在人权；中国历史上的原则其立点在政权。故而应无是无非才是。你的专业是戏剧，我想狄更斯笔下的《双城记》你一定拜读过。贫穷人造反，把法国贵族送上了断头台，就连被雇佣在贵族家里的年轻的贫穷的农村姑娘也被拉上了断头台。她看着站满台下的愤怒激昂的和她一样穷困的人群，毫无恐惧毫无怨恨的从容的把脖子架了上去……正是：任何大革命都会有无辜的人为之牺牲。人们所看到的只是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不会去理会死在车轮下的人。

再看中国宋朝的“严蕊”，她是被大儒家朱熹为官时打入冤狱。朱熹的下一任官员接手后，审其冤情决定将其放出大牢。官问：我把你放了你又如何呢？严蕊答道：待到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她的意思是，一旦我自由了，哪怕是去要饭，也不用你们这些当官的管。

严蕊为什么不上京城高法去申诉呢？中国啊，中国，你的人民多么的可泣可爱……中国的官，若再不为民作主，只想自己如何能升官发财，只顾无限的满足自己的私欲，那又成了什么呢？

康熙皇上说：为官没有不贪的，要不当官干什么？就拿你们中所谓的清官，若是认真查办起来，没有一个是该杀的。康熙明知满朝贪官污吏，可又为什么不抓不杀呢？他说了，只要在大节上忠于朝廷就行了。也就是说，康熙的立点是政权，是保住自己的江山。而我国是人民的共和国，江山是人民的，故而立点就应该立在人民上，立在人权上。这是我国宪法的性质决定的。但是又是为什么五十年来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而要申诉却又是抱着猪头找不到庙门呢？前者是因为思维惯性致使防范失度，后者是因为中华是礼仪之邦。所谓的礼仪之邦是最重脸面，并把脸面当成了尊严。故而错了就任其错下去，留着让下一任去纠偏，而本任是必须要硬挺着坚持到底的，否则面子又往哪儿放？就是让你申诉无门，你又能如何呢？

我在酒店的房间里换上了新鞋、新衣、新帽，朋友立即去结了房间的帐，带我去逛“夫子庙”……我对熙熙攘攘的繁华很是默然，也很不适应。尽管没人会认出目光呆滞，反应迟钝，一身三新的我是刚从大墙里跑出来的。我们走进夫子庙南京特色的风味小吃店，是朋友预先订好了包间座位，一道道的小吃和专门的歌舞女的表演，令人心中不安。我让朋友去告诉一声，歌舞免了，但钱一定要照付。有钱人座上吃喝玩乐，无钱的歌舞女面上充满苦相的表演，实在是让我难受的很……也许这就是南京

的所谓的歌舞升平.....

象征性的吃了一些，朋友们给了我一些路费和生活费，让我必须连夜离开南京。因为南京当局有令，出狱后必须立即离开南京，不准在南京停留和过夜。我想，他们可能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我不走，反而会牵连和难为了朋友。故而未能去你家安慰期盼你早日出狱的家属。

一晃五十天过去了，我还没找到能落脚的地方，打算找个房租便宜点的地方遮风避雨。因为南京当局抓我时，没收了我的一切财产，并坚持不给退还，尽管法院并未判处没收我的任何财产。

我想你出来以后，环境会使你尽快的忘却以往的一切，你毕竟还有个家，有房子和私有财产，当局也不会再找你的麻烦。实际上我离开南京以后，也并非像南京当局向我说的那样，会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这五十天里没人骚扰我，当然也没人问我吃饭没有？虽然暗中我仍发现有人在监视我。比如让物业的老太太敲门看看我说：通知一下房东该交管理费了。我走在社区里时，社区警务和一个穿警服的派出所民警忙出来看我以便认人.....不过他们都不干预我，不和我发生正面冲突，我想这是例行公事，你我都应该理解。

因为当局虽是把关进监狱，但是并不知道我到底要干什么？只是一种防范于未然。尽管五年的大牢坐过去了，放出了大墙，当局心里还是没底，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在南京监狱里，当局多次问我出去后干什么？我说出去后要吃饭，要有地方住.....当局总是不相信。是他们自己无中生有，把问题搞得复杂化，又找不到那个有，故而越想越复杂。我只能这样去理解，他们是希望社会稳定，其出发点是好的，只是作法过激。

五年的大牢过去了，对于你这位白发苍苍六十五岁的人来说，失去五年的生命，实在是一肚子怨恨。就只当作是一场戏吧，仅仅是在这场戏里你的角色是囚犯。

人类总是有灾难的，人类就是从各种各样的灾难中走到了今天。但人类依然快乐的活着，像一群大飞蛇.....并不去理会那颗大灾星，亦即土星又会如何。望你能尽快溶入人类的海洋.....

昔日的狱友 妙航 于 2006 年 2 月 20 日